

从“离土教书”到“在地嵌入”： 乡村教师新乡贤角色的生成与公共精神塑造

彭玲艺 李梦芳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湖南 长沙市 410205）

摘要：基于社会学嵌入理论，本文揭示乡村教师从“离土教书”走向“在地嵌入”需经由关系、结构、情感与制度的四重协同嵌入，并以“选择性有机嵌入”在地方融入与理性批判间维持反思性距离。乡村教师向新乡贤角色的转化，由时代逻辑的身份跨越、文化资本的地方溢出与内生动力的使命觉醒三重机理协同驱动，其公共精神经由情感外化、理性渗入与担当刚性化递进凝练。新乡贤角色生成本质上是教师突破科层化困境、重构生命意义的自我超越之路，为理解教育赋能乡村治理提供了“结构—个体”互动的学理视角。

关键词：乡村教师；新乡贤；在地嵌入；公共精神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度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教师公共精神培育研究”（课题批准号：XJK22BJC001）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彭玲艺（1981—），女，湖南湘乡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教师教育和教育心理学。

李梦芳（1989—），女，郴州人，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马田镇中心小学，研究方向：小学教育和乡村教育。

1 引言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关键在于人才与文化的内生性重构。传统乡土社会中，乡村教师历来扮演着“亦教亦贤”的复合角色，既是传道者，又是深度参与村落公共事务的地方精英。然而，随着城乡教育一体化与学校科层化管理的推进，标准化课程与绩效评价体制在提高教育效率的同时，也悄然剥离了乡村教师的公共身份，将其专业行为窄化于校园之内（王浩宇，2024）。现实中，乡村教师普遍陷入“工作在乡村、栖居在县城”的“两栖”悬浮状态，催生了典型的“离土教书”现象。这种公共性的式微，不仅加剧了乡村精英的流失，更导致乡村学校沦为向城市输送人口的“中转站”，消解了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制度初衷。2020年，教育部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注重发挥乡村教师新乡贤示范引领作用”，为乡村教师公共性的复归提供了合法性制度基础。然而，既有研究多停留于应然层面的价值呼吁或流动意愿的微观计量，缺乏从社会学“结构—个体”互动视角切入的系统推导。基于此，如何打破“离土教书”的现实藩篱，推动乡村教师实现“在地嵌入”，进而在身份认同上重塑“新乡贤”角色，成为当前教育社会学交叉研究的核心议题。

2 从“离土”到“在地”：乡村教师“嵌入”乡村社会的理论逻辑

消解乡村教师“离土教书”的悬浮状态，本质上是推

动其社会网络、组织结构、情感依恋及制度认同等方面与乡土社会全面“再嵌入”的过程（周兆海、张爱爱，2026）。这一进程并非盲目的空间驻留，而是多元维度交织的复合网络。其中，突破校墙藩篱的关系嵌入与吸纳教师参与村落治理的结构嵌入，重构了教师在熟人社会中的行动合法性与话语管道（凡勇昆、郑苗苗，2025）；个体对乡土文化的觉察与依恋（马多秀，2017），则在情感嵌入层面将职业规训内化为地方情怀；而定向培养、职称调适等制度嵌入，则为微观生态的持续运转提供专业尊严保障（徐红，2024）。四重维度的有机协同，筑牢了乡村教师从空间驻留走向社会心理深层“在地嵌入”的学理底座。

然而，嵌入理论同样提示了“过度嵌入”可能导致行动者丧失自主性与批判反思能力的风险（Uzzi, 1996；符平，2009）。乡村教师作为现代公共理性与主流价值的持守者，若在社会融入中丧失独立性，极易沦为地方宗族势力的附庸或陈规陋习的妥协者。因此，本文主张的“在地嵌入”，本质上是一种追求“反思性距离”的实践。乡村教师应当保持“温和的局内人”姿态，在地方性知识与现代性启蒙之间维持必要的批判性张力。这种张力的维系，有赖于“县管校聘”等制度嵌入所提供的“保护性距离”。

基于此，本研究对乡村教师“在地嵌入”的路径选择提出一个理想类型假设：其成效取决于个体的“认知—行动”框架。在理想类型的两极，若教师秉持“适应者逻辑”

辑”，往往奉行消极趋同，在日常交往中易丧失专业批判性，滑向消解现代公共性的过度嵌入；反之，若教师秉持“对话者逻辑”，则能坚守理性启蒙姿态，从而将四重再嵌入网络内化并重构为施展文化反哺的结构性资源。正是通过这种保持反思性距离的“选择性有机嵌入”，乡村教师方能超越体制雇员与守旧乡绅的双重藩篱，切入“新乡贤”的角色重塑轨道。

3 乡村振兴中乡村教师的“角色重塑”机理

乡村教师向“新乡贤”角色的转化，是一个承续历史道统、因应时代诉求并在多重资本激荡中完成身份内化的转型过程。根据社会身份认同理论，角色建构是个体与外在社会结构持续互动的产物（王艳玲、强发瑛，2025）。在乡村振兴实践中，这一角色重塑体现为时代逻辑、文化资本与动力机制三个维度的交互演进与协同重构。

3.1 时代逻辑的因应：从国家体制雇员到“新乡贤”的身份跨越

从历史发生学视角审视，传统乡贤主要依托宗族血缘和地方威望维持治理合法性；现代化转型后的“新乡贤”，则是乡村新文明与现代善治的引领者。乡村教师向新乡贤角色的重塑，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化民成俗”历史道统在当代的范式转换与合法性重构。面对乡村精英流失与文化式微，国家明确要求乡村教师承担起“本土精英”的时代使命。当前国家倡导的教育家精神培养为乡村教师“再嵌入”新乡贤角色提供了根本的精神指引（周兆海、张爱爱，2026）。乡村教师通过这一角色重塑，将自身专业行为与乡村振兴战略深度嵌入。他们成功超越了单纯作为科层体制底层“技术执行者”的工具属性，转变为承担激活地方文化、协调地方利益、协同乡村善治的历史主体。这种从科层雇员向地方精英的跨越，重构了教师的社会声望，并在现代国家治理话语中为新乡贤角色确立了坚实的合法性。

3.2 文化资本的溢出：从“文化异乡人”到“地方文化中间人”

在城乡流动频繁背景下，乡村教师队伍的学源结构日益异质化。威海燕等（2018）的研究表明，大量非本土生源的乡村教师，由于缺乏深层的乡土文化认知与地缘情感连带，极易产生“无根性”认同危机，在现实中陷入“文化异乡人”困境。

新乡贤角色的重塑，高度依赖于教师自身文化资本的主动激活、外溢与地方化调适。乡村教师作为现代知识与公共理性的承载者，拥有乡村最紧缺的制度化文化资本。当教师通过“选择性有机嵌入”深入村落生活常态时，其

掌握的科学知识、法治思维与文明风尚，便开始跨越校园边界发生外溢。通过参与地方民俗重构、乡土教材编制及公共文化空间的活化，乡村教师将自身的现代文化资本转化为能够被村民理解和接纳的社会资本与道德声望。在这一互动中，他们成功重塑为连接现代城市文明与乡土地方性知识的“地方文化中间人”，消解了文化孤立感，使学校的文化能量成功向村落反哺。

3.3 动力机制的演进：从“职业义务规训”到“内生使命自觉”

任何社会角色的稳固确立，都伴随着个体行为内驱力的范式转换。传统的乡村教师管理体系高度依赖外部的行政规训与标准化的绩效考评，这种外在压力维持了教育系统的基本运转，却极易导致教师产生专业异化与职业倦怠，将其专业身份窄化为科层制底层的“流水线工人”（王浩宇，2024）。新乡贤角色的确立，必然依赖于教师个体从外在行政规训向内生使命感驱动的动力机制转型。魏薇等人（2024）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发现，新生代卓越乡村青年教师在扎根乡村的过程中，普遍经历着从职业义务走向公共责任的动力演进路线。在“再嵌入”乡土社会的长期实践中，教师在见证乡村儿童命运变迁、体验与村民的命运连带时，内心的“大先生”情怀被深度唤醒。这种使命感作为内驱力，促使教师将外部政策期待与乡村社会的善治诉求，转化为自我生命意义重构与专业尊严实现的个体选择。通过外在规训与内生使命的协同整合，乡村教师最终完成了从被动的行政“被管理者”向主动的“新乡贤”的身份质变。

4 乡村教师新乡贤角色下“公共精神”的实践凝练

如果说“新乡贤”是一项社会学身份标签，那么“公共精神”则是这一身份的核心实质。公共精神超越了狭隘的私人职业利益、家庭血缘纠葛或科层绩效算计，指向地方社会公共福祉的达成、公共秩序的维护与公共价值的彰显（凡勇昆、郑苗苗，2025）。乡村教师在完成“在地嵌入”与“角色重塑”后，其公共精神主要在跨场域的乡村治理与文化反哺行动中，通过持续的实践淬炼为三重行动特质。

4.1 情感外化：将“乡土情怀”提炼为“文化反哺”行动

乡村教师的乡土情怀是对乡村、农民、农村儿童的深切关怀，以爱与责任为情感基石（马多秀，2017）。然而，在传统封闭的日常教学场域中，这种情感往往容易停留在个体“乡愁式”的柔性体验层面，缺乏对现实乡村社会的改造力。在乡村振兴实践中，新乡贤教师公共精神的凝

练,首要表现为将这种主观情怀外化为内生性的“文化反哺”行动。王艳玲等(2025)的研究证明,本土培养或深层嵌入的乡村教师由于具备天然的地缘根基,其留任意愿与工作投入度显著更高,这种稳定的专业品质构成了公共精神外化的基础。新乡贤教师有意识地模糊学校与社区的边界,活化校园资源向村民开放,通过创办“乡村夜校”、“家长学校”与托管课堂,为村民提供现代文明素养与实用技术培训。此时,个体零散的乡土依恋,在制度化的社会反哺中被提炼成了守护村落文化尊严的公共精神符号。

4.2 理性渗入:将“知识权威”转化为“风尚改造”的柔性力量

乡村社会作为熟人社会,其日常运行往往交织着宗族势力、面子人情及陈规陋习,成为阻碍乡村善治的结构性障碍(王浩宇,2024)。乡村教师作为新乡贤,具有独特的精神教化与风尚改造使命,其公共精神的智力表征集中体现为将自身的知识权威转化为改造乡村不良风尚的实践精神。在具体的治理行动中,新乡贤教师遵循“选择性有机嵌入”所要求的反思性,遵循“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辐射整个村落”的教化逻辑。他们将现代公共理性、科学文明生活方式以及法治思维引入到村落的移风易俗协商中,对天价彩礼、迷信活动等陈规陋习进行理性消解。正如魏薇等学者(2024)所示,教师通过组织公共实践,逐步建立起了村民对现代公共价值的交往共识。这种在传统守旧中激发出理性启蒙的行动,构成了乡村教师公共精神的批判性与建设性特质。

4.3 担当刚性化:将“职业本分”外化为“超越性使命”在现代化科层制与制度化教育环境的挤压下,面对繁

重的非教学事务与乡村衰落现状,部分教师容易表现出“退缩型理性”,选择在“职业安全区”内消极应付。而乡村教师公共精神的最高境界,在于实现从“干一份工作”的职业本分向“改写一方水土”的超越性使命践行跃升。周兆海等(2026)强调,“志在贤达,协同善治”是教师公共性的终极表现。当乡村公共利益遭遇调整困境或村落文化面临断代危机时,具备新乡贤身份的乡村教师能够突破个体利益算计,超越狭隘的科层职业边界,以高度的责任伦理主动出场。他们发挥组织协同力与道德号召力,扮演村组织、普通村民与外来资源之间的信任黏合剂,协助处理公共纠纷,争取外部发展项目。这种刚性担当,标志着乡村教师的公共精神在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中真正沉淀为稳固的责任伦理。

5 结语:重返乡土社会的教师生命意义建构

从“离土教书”的悬浮两栖,到“在地嵌入”的有机融合,乡村教师新乡贤角色的重塑与公共精神的实践凝练,绝非单纯宏大叙事下的道德规训,而是乡村教师个体突破职业倦怠、重构生命尊严的自我超越之路。“角色重塑”消解了教师作为体制雇员的窄化与阶层悬浮,赋予其作为新乡贤和文化中间人的独特社会声望与行动合法性;“公共精神的凝练”则将静态的情感依恋淬炼成了兼具理性启蒙与刚性担当的行动之魂。当乡村教师不再将乡土视为职业迁徙的“跳板”,而是将其视为安放教育理想、施展公共才华的“精神家园”时,他们必将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洪流中,实现专业尊严与公共价值的激荡共鸣,从而写就现代教育向乡土社会高质量反哺的崭新篇章。

参考文献

- [1]王浩宇.乡村教师担当新乡贤角色的实践困囿与突围进向—基于拟剧理论的阐释[J].当代教育科学,2024(7):73-80.
- [2]周兆海,张爱爱.“脱嵌”与“再嵌入”:教育家精神引领下乡村教师新乡贤的角色构建[J].教师发展研究,2026,10(1):28-34.
- [3]凡勇昆,郑苗苗.乡村教师新乡贤角色的内涵特征与发展路径[J].现代教育管理,2025(9):87-94.
- [4]马多秀.乡村教师的乡土情怀及其生成[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7,37(13):42-45.
- [5]徐红,董泽芳.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乡村教师[J].教育研究与实验,2024(6):142-148.
- [6]Uzzi B. The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Embeddedness for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Organizations: The Network Effect[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6, 61(4): 674-698.
- [7]王艳玲,强发瑛.乡村教师本土培养何以必要:来自5342份问卷的证据[J].教师教育研究,2025,37(5):82-91.
- [8]威海燕,吴长法.源自城市的乡村教师文化认同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18,38(4):16-23.
- [9]魏薇,徐芳.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教师使命感践行动力机制的质性探赜[J].中国教育学刊,2024(3):97-102.